



系统观念是新时代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黄力之

The Concept of Being Systematic Is the Fundamental Way of Thought and Work in the New Era

HUANG Lizhi

引用本文:

黄力之. 系统观念是新时代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J]. 学术月刊, 2021, 53(10): 5-16.

HUANG Lizhi. The Concept of Being Systematic Is the Fundamental Way of Thought and Work in the New Era[J]. *Academic Monthly*, 2021, 53(10): 5-16.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www.xsyk021.com/article/Y2021/I10/5>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体系和理论逻辑

The Doctrinal System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学术月刊. 2021, 53(5): 5-16

论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起点

Marx's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State and Law and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State Socialization

学术月刊. 2021, 53(6): 19-30

共同体的伦理意蕴：滕尼斯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社会国家观”的综合

The Ethical Implication of Community: Ferdinand Tönnies' Synthesis of Hegel's and Marx's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学术月刊. 2021, 53(5): 134-145

马克思和阿伦特论“犹太人问题”

Marx and Arendt on the Jewish Question

学术月刊. 2021, 53(3): 27-34

权力的正当性基础：早期儒家“民意论”的形态和构成

The Basis of Legitimacy of Political Power: The Form and Constitution of Early Confucianism "Theory of People's Wishes"

学术月刊. 2021, 53(3): 5-16

尊严与必然性：康德伦理思想的伍德式阐释

Dignity and Necessity: Wood on Kant's Ethical Thoughts

学术月刊. 2021, 53(6): 31-44

系统观念是新时代基础性的 思想和工作方法

黄力之

摘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历史舞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创造性运用首先在于，提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意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科学性基础。其次，系统观念运用的具体表现是，对人类社会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系统性分析，按照大系统制约小系统、小系统促进大系统，系统内一切要素相互联系的原则确认其关系，在研究这三大规律的过程中做到“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 系统观念 三大规律

作者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 200233）。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1)10-0005-12

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①将系统观念定位为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哲学上的阶段性总结，为我们如何面向未来提供了思想方法论的明确指引。

一、新时代相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962年1月，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指出：从20世纪中后期算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今天，毛泽东这一讲话的发表时间已经差不多过去一个甲子了，我们站到了21世纪的五分之一段结

^①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2版。

束处,世界正处于翻天覆地的变化之中,中国亦已经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何以自处,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说,最初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描述是比较平和的,而后,随着各种事态的发展,出现了令人不安的一些因素,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描述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②

由此可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20 世纪初期以来国际关系格局进一步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尽管两次世界大战都击败了德国对英国霸权地位的挑战,但大英帝国也终而衰落,苏联、美国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德日法西斯的契机,以及它们自身核力量的形成,构建了两个阵营对峙的世界秩序,苏美争夺世界主导权;与此同时,旧殖民主义体系解体,更多新兴国家包括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然而,20 世纪末期,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苏联阵营坍塌,美国及西方盟国赢得冷战的胜利,被福山誉为“历史的终结”,此后,美国一家独大,单边主义大行其道。

进入 21 世纪以后,一方面是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另一方面是,2001 年在美国本土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西方与穆斯林世界不断发生冲突,至今未绝。而后,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西方世界出现系统性危机,从经济、社会、种族到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体制失灵表现明显,西式民主制度在全球的引领地位发生动摇。

2017 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试图用对抗的方式去解决美国的难题,推卸国际责任;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乃至意识形态冲突,肆意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甚至以战争相威胁,世界秩序出现前所未有的乱局。就在此时,2020 年全球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欧美社会显然抗疫不力,使得疫情的冲击与其他社会危机叠加。2020 年 5 月 20 日,美国政府发布了《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这份文件中的内容声称,自 1979 年与中国建交以来,美国在对华策略上一直是“抱有希望的”,美方希望通过接触交往,能使中国“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然而 40 年后的今天,美方认为自己并未如愿。美国认为中国正在试图重塑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秩序,“这既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也侵害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严”。文件直指中国正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三大方面对美国发起强烈挑战。文件写道,“美国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接受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标准与原则”,美国将持续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在必要时将会采取行动,并与自己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一道抵制来自中国的威胁,以保护美国的利益。^③

2021 年 1 月,拜登取代特朗普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4 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 年战略竞争法案》,强化美国应对“中国威胁”的外交战略,重申美国对盟友和伙伴国家的承诺,并重申美国在国际组织和其他多边论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应对中国在西半球、欧洲、亚洲、非洲、中东、北极和大洋洲构成的挑战。法案确定,美国继续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教育领域、军事武器等方面遏制中国的发展。由此显示出,美方将沿袭特朗普政府的思路,反对中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试图迫使中国就范,做出改变,以达到美国所预想的目的。

从中美关系变化的角度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当然,世界的危机并非绝对。拂去国际关系的层层浮云,还是可以看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亮

①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4 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3 页。

③ 安刚:《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又向前迈了一步——对白宫发布“对华战略方针”的基本看法》, www.yidianzixun.com。

色。由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类文明正在酝酿新的突破，具体表现在：信息技术已经与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发展，人工智能、5G 通信、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并使得增材制造（3D 打印）、虚拟和增强现实等渗透到生产和生活中。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发展及其与生物、材料等多学科、多技术领域相互渗透，工业革命以来最具颠覆性的新科技产业革命正在发生。

新科技产业革命必将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生产组织和社会分工方式将更倾向于社会化、网络化、平台化、扁平化、小微化；产业的传统边界模糊化、产业组织网络化、产业集群虚拟化、组织结构扁平化；大规模定制生产和个性化定制生产日益成为主流制造范式；提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将不再依靠规模经济，等等。高科技革命正在逐渐重新定义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个人，称雄二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也在改变自己的既定模式。21 世纪中后期的世界将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状态下展开自己的未来。

放眼历史，世界之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并非今日所遇，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性世界本来就是不稳定和不确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世界文明就可能回到发展迟滞的古代状态。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处在 18 世纪至 19 世纪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则是处在 20 世纪至 21 世纪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犹如自然界的电闪雷鸣般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从根本上塑造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性力量；作为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体系的历史实践者，身处新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在新的历史舞台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在新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世界大变局向我们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使命问题。世事沧海桑田，一切具体事物和关系都在不停地变化，没有人可以精准把握未来世界的一切，也就意味着，任何一种关于社会变革的思想都不可能按照事先的设定而一成不变地运行，包括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的努力方向何在呢？后马克思时代的人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毫无疑问应该是坚持与发展并重。坚持是相对容易定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对于一个哲学体系来说，其生成的可能区域应该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原理的构建，一个是将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解决问题的实践中，也就是一种创造性验证。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构建任务，是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即马克思恩格斯来完成的。马克思的时代是创造新哲学体系的时代，当时存在两个特殊的重要条件，一是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进入“天花板”——达其顶峰欲破之，一是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型文明，旧有哲学体系已经不能解释了。

所谓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进入“天花板”，乃是指当时的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难以自我突破。当然，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其他文明体哲学也有自己的历史高度，只是，关于德国古典哲学与这些哲学之间的关系，需要另行讨论，此处不论。

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基本要件有两个：一是唯物主义，一是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在吸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及黑格尔的辩证法基础上而构建的。当然，思想史本质上是不断延伸式的，而不是白板上突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也不是费尔巴哈、黑格尔始创的，他们同样是在前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4—35 页。

人基础上完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唯物主义思想在古希腊已经有了较充分的发展，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德谟克利特。从文艺复兴开始，依托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总是以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又得到了大的发展，如笛卡儿、斯宾诺莎、狄德罗、爱尔维修，直至费尔巴哈。费尔巴哈的意义在于他对传统唯物主义的弊端作出了纠正，避免了对唯物主义的纯粹物质本体的解释，在批判宗教的基础上发扬了人文主义精神。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实证基础来自他所熟悉的与生命活动相关的科学知识，因此，他把自己的学说称作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表明古典唯物主义的使命已经完成，只要历史条件成熟，它就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理论基础。

辩证法思想的历程也大致如此。在古希腊时期，辩证法思想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许多智慧的思想已经产生出来。到德国古典哲学阶段，黑格尔以集大成的态势对古典辩证法作了一个总结。黑格尔以宇宙本质——“理念”为核心，揭示了自然、历史和精神世界的统一发展过程，即所谓逻辑阶段、自然阶段、精神阶段。黑格尔认为，这个过程的本质的就是所谓辩证法，辩证法的核心是一切变化取决于事物的内部运动，“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①“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②

之所以说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天花板”，乃是因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尽管已达相当高度，但都存在致命的缺陷，只有突破“天花板”才能进入新的境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主体性价值得到了确认，但“人”是抽象的、是生物性的，实际上人只能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能说明人的社会本质，也就不能从人所处的社会机制去揭示人的活动的真正动机，结果还是只能从人的自我意志去解释，费尔巴哈就寄希望于“人类之爱”去解决社会问题，最终仍是落主入唯心论的窠臼。而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体系固然非常完备，非常富有逻辑力量，也能在自然或社会的现象中得到验证。但是，由于这个体系一开始就是立足于脱离客观实际的“绝对理念”的，它只是聪明地构筑于哲学家的头脑中，不能科学解释社会变动的内因、外因及其关系，不可能带来全新的方法论革命。

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平台上，恩格斯针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成就与局限，以及他自己与马克思所进行的批判性构建，指出，“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③这实际上就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性改造。毛泽东对这一场哲学革命作了如此描述：“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④马克思恩格斯在终结旧哲学的同时开创了新哲学，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构建。

关于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型文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的影响，恩格斯亦有非常明确的论断，他说：“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⑤应该说，恩格斯在这里揭示了人类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任何哲学思想的实质性推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66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296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0页。

进，应该都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程度，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不是冥思苦想的结果。

然后，恩格斯描述了当时哲学思想发展的特殊背景及其结果，他说：

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要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科学家的意志，使他们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不得不承认的时候，自然科学就最终被清除了。……这样，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①

当恩格斯如此总结出 19 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包括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成果对思想史发展的革命性意义时，本身就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之重要来源与机制，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自觉与自然科学的革命实行对接，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完成了新哲学体系和基本原理构建的宏伟任务，而且对于哲学和世界的关系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命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后马克思时代的人们来说，我们的任务不仅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释世界，而且将其用于指导对世界的改造，亦即将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解决时代问题的实践中。

当下，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危机与契机同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仍是分析世界的有效工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的努力方向定位于创造性运用，乃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征，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思路。1895 年 3 月 11 日，恩格斯写了一封信给德国学者韦尔纳·桑巴特，谈及后者写的《评卡尔·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批判》一文，提到资本家的平均利润额问题，恩格斯回应说，“马克思本人对此谈得不多。但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在此意义上，列宁亦说：“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③

恩格斯显然认为，在哲学层面上承认和接受马克思创立的新世界观固然重要，但是，一旦触及对具体社会问题的解释，那就必须将这种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否则既不能解释也不能解决具体问题。有幸的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充分理解恩格斯论断的意义。毛泽东说得很直白：“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④毛泽东还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永远不会胜利。”^⑤

凭着这种实质性的理解，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1937）中使用简洁的语言透彻地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第 300—301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64 页。

③《列宁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60 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39 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19—820 页。

阐明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他说:“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处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①毛泽东在同期的《矛盾论》中还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善于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有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当着眼于观察认识世界时,就是世界观;而当着眼于改变世界时,就是方法论。

在毛泽东那里,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其实就是知行合一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是“知”,它是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毋须再去创造,而拿这样的世界观去看世界、研究世界上的问题、指导革命、做工作、从事生产等等则是“行”,充满着大量的变数以及复杂的关系,永远处于全新的过程。同样是革命,俄国的革命不同于西欧的革命,中国的革命又不同于俄国的革命;同样是追求现代化,也是各国均有不同之处,不可一概而论。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时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最新理论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这一新的思想当然是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道路继续前进的,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精髓在于:实事求是,经世致用。

早在2016年5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 and 有效办法上来。要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战略性、系统性思维,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既看存在问题又看其发展趋势,既看局部又看全局,提出的观点、作出的结论要客观准确、经得起检验,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大趋势。”^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时代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智慧结晶和理论典范。下文将以系统观念为统领,具体展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当今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实践应用。

三、系统观念与新思想对“三大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关于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保尔·拉法格曾经做过一个概括:“他巧妙地把一种事物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再综合起来,描述它的全部细节和各个不同的发展形式,发现它的内在的联系。他的论证方法,不是抽象的如有些不能思索的经济学家所非难他的那样。他的方法不是几何学的方法,几何学家在从周围世界抽出自己的定义之后,就完全脱离现实基础演绎出结论。我们在《资本论》中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定义或公式,我们所看到的是对现实的一系列高度精密的分析,这些分析把最细微的差异和最小的区别都表达出来了。”^③这里说的是,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一方面始终从实际出发,不陷入经院哲学命题;另一方

①《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③ 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0页。

面，那就是总体性特征，即不断进行部分与总体之关系的分析、综合，这种思想方法亦称系统观念或者系统思维。

前文已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必须注意到，这是高度概括性的提法，置于其他的思想和方法之上，而不是平行或者并列。在此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及诸种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的时候，多次使用过“系统”“系统观念”词语，实际上表达出系统观念。例如早在浙江主政期间，他就提出：“各级党政‘一把手’要站在战略的高度……要努力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以‘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度和胸襟，始终把全局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全局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以世界眼光去认识政治形势，把握经济走势，了解文化态势；……不断提高领导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①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要求全党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几个具体思维方法无不体现着系统观念的渗透和引领。

可以理解为，将系统观念提升为“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其重要意义在于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科学性基础，强调科学地认识世界。系统观念具有狭义性和广义性，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系统思想属于狭义性，兴盛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科学界，但是，作为方法论的系统观念早已形成。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关于整体和部分关系的论述中就呈现出了整体系统性思想。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形而上学》中就以人的手指与人的整个身体关系来表达系统观念：如果一个手指不是存在于活的身体上，那就是一个死的手指——名称上是一个手指，部分的意义只存在于整体中。后来，黑格尔在《美学》中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由此，现代系统论的奠基人贝塔朗菲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及其固有的整体论和目的论的观点就是这种宇宙秩序的一种表达方式。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种表述，至今仍然正确……基本的系统问题至今尚未过时。”^②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于19世纪，当时还没有成熟的系统科学体系形态，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总结和概括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实际上提出了系统科学的一系列思想。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首次提出了“社会机体”的概念，反对“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来研究社会，他说：“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③后来，马克思又使用了“有机体制”的概念，说“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生成为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④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再次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⑤可以说，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生成，由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人类社会诸多要素之间的全面性联系与有机性互动，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运动系统。因此，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认为，整体对于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决定性地位，是马克思全新科学的方法本质。

当然，后来形成的自然科学的系统论，给哲学意义上的系统观念包括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念带来了新的

①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0页。

② 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学译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05—30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3页。

发展契机,钱学森在回答“系统科学有没有哲学”这个问题时,就提出,系统科学“这个理论而且要概括成哲学,而这个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这个桥梁来指导系统科学的工作,系统科学工作的实际的得到的经验又概括总结起来,来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①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亦可称为广义的系统观念。

系统观念作为总体性范畴,其科学性体现在:强调系统性总体对部分的制约,总体大于部分之和,脱离总体的部分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在一个总体中,部分的功能取决于总体,只有恰当运用并改进部分的功能,总体的存在与发展才是长期的、推进性的;系统在开放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功能等等。

在当下,新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念的创造性运用,聚集于何处呢?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围绕“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②而之前,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已经提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由此可以说,新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这完全体现了马克思的思想方法特征,对现实生活进行分层次的系统分析,找出应对的方法。

以系统观念观之,对三大规律的新认识应当进行倒过来的排序,即是说,对于社会人来说,最大的系统是人类社会;由于社会主义目前不是人类社会形态的全部内容,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中层系统;而共产党这个组织亦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内容,因此,共产党执政是社会主义系统中的小系统。

当然,对共产党人来说,对三大规律的探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为什么还要提出“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呢?恩格斯说得好,“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③就是说,系统观念所言之系统,并不是静止事物形成的固定结构,而是过程的结构,即“过程的集合体”,探究“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的过程,必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首先,新思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是在当下对人类社会发展新规律的新认识。

关于人类历史,毛泽东《贺新郎·读史》词云:“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毛泽东用“石头”“铜铁炉”这种具象词汇揭示出,生产工具的新发明一方面推动文明阶段的提升,另一方面加速了人类不同群体关系的由分而合,终于在工业革命之后形成了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历史实际上是由于人们的不同意志之间冲突而成的。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对历史行为之价值判断,并非人人认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扩张,尽管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的阶段性进步,但生活在古老文明中的民族与国家一方面有着强烈的因循守旧惯性,另一方面愤怒于西方列强的霸权主义,不愿意改变自己,演变为内涵复杂的冲突,如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也暴露出自己的不可持续问题,社会化的大生产提供了大量产品,而私人占有的形式又遏制了社会的消费能力,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恩格斯预言,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存在必然导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这是基于19世纪的状况对人类社会发展新规律的最新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便产生于此。尽管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的预想发生,但是,毕竟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冲破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大系统的一体性,

① 见经士仁整理的会议综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系统科学的工作》,《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2年第5期。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8页。

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体系。

站在 21 世纪的前期，我们会看到，一方面，由民族国家存在带来的国家利益的对立依然存在，而且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交错在一起；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超国家存在，人类面临的新型威胁（核战争、地球环境的恶化、新型病毒的攻击、信息化危机的平面化、科技革命之不可预测后果等），使得单一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难以独自对付全球性灾难，人类命运的共同性成为不可避免的未来状态。如此，人类社会发展的新使命便出现了，也就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世界历史”、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最终远景等马克思主义已有之概念来看，新思想中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保持了对人类命运美好愿景的共同关心，而且保持了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性立场——资本逻辑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后破坏性因素。例如，抗疫不力的问题，地球环境的严重污染问题，事实证明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才会出现对人的生命不负责任的现象。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比人类社会系统更大的系统是自然界，是自然界的空间和时间存在——宇宙。对此，新思想当然不会忽略，于是创造性地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解决之，就是说，当人们说到当下的人类社会系统时，它不是外在于或者独立于自然界的一个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本体论命题。

由于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要顺应客观规律行事。这种顺应表现为，提倡多边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开放、合作、共赢，反对任何形式的称霸、扩张、对抗，其中内在包含着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批判，以及列宁在 20 世纪前期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显然，新思想提出的中国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及其做法，体现的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其次，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新思想的着眼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尽管社会主义运动是世界性现象，但历史发展已经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社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任何历史主体都只能完成自己能够完成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而目前的首先任务仍然是对中国自己的事情负责，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成功。由于人类社会是大系统，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从属的最大内涵是什么呢？那就是人类文明史上已经产生的现代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倘若离开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也无从体现。

社会主义运动是世界性现象，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晚于苏联。因此，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既要着眼于苏联的实践，也要着眼于中国自己的实践，而不是着眼于书本。1961 年，英国蒙哥马利曾经问毛泽东：“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坦然回答说：“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问苏联。”^②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当然有成功的一面，否则，苏联不可能在十月革命之后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也不可能在战后很快复苏，抗衡美国的世界霸权。但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的确存在问题和弊端。1956 年 9 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谈到斯大林问题，毛泽东说：“斯大林的错误，有它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但主要应从主观认识上找根源。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仍找对象，大批抓人杀人。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③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 页。

②《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28 页。

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631 页。

如果说,持续进行阶级斗争,形成国内政治紧张,不努力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这是苏联模式在政治上的弊端;那么,在经济上,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斯大林在理论上肯定“两个平行而对立的世界市场”,实践上满足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苏联模式在经济上的弊端。

从中国自身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政治基础。此后,从1949年到1978年,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难探索,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发生了某些挫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进行了重要的总结,对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全方位的思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党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

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同时又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大等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并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①

在这个决议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等要素都已经确立,改革开放的实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并成熟的过程。2017年,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新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成功就在于能够从全球系统的角度,而不只是从中国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邓小平在指导改革开放时,再三强调全球系统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告诫人们,在现在的世界上,闭关自守是发展不起来的。中国的现代化,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必须顺应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当下,美国试图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外部考验。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新思想以“三新”(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应对之。其中,“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尤为重要,这是继邓小平之后对世界历史是“过程的集合体”的新认知和再尊重。现在的中国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的是,已经拥有强大生产能力,拥有超规模的消费能力,拥有丰厚的资金积累,升级版的国内大循环足以应对任何外部打压。同时,中国坚信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中国的建设要继续顺应之,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扩大内需,完全可以释放巨大而持久的动能,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和增长,这既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发展之道。

再次,关于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中国是次于人类社会的系统,而在中国系统内部,共产党又是一个次之的系统。但是,这个小系统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系统,它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决定中华民族复兴的命运。关于中共与中国命运之关系,基于苏东剧变的刺激,美籍历史学家邹说在1991年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113—115页。

就判断：“任何人如果期望中国的领导人和他们长期的追随者——在 28 年的长期革命中夺取了全部政权并统治了中国达 40 年之后——将不经过一场殊死决战（哪怕这将中国引向崩溃的边缘）就放弃权力，是不现实的。只要想一想中国巨大的人口，惊人的贫困，沉重的过去及其与西方的文化距离，我们不得不怀疑，在那样一种大危机中，不论国内还是来自国外的力量，有谁能够成功地挽救中国。”^① 这种观察其实就是换一个角度承认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之间内在而必然的联系。

因此，新思想将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确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掌握的根本规律，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因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改革开放的成功，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这是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无可否认。新思想提出，共产党执政规律之最高层面，就是“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之心，日月可鉴。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③ 既注重总体谋划，又注重牵住“牛鼻子”，这就是系统观念的运用。

实际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者之间，已经存在着概念上的交错关系。“深化改革”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它可以包含所有调整生产关系及完善上层建筑的行为，包括法治建设的改革以及党的建设的改革，并没有限定在某一方面或者领域。那么，为什么要从大概念里再提出两个小一点的概念呢？从方法论说，这就是在主要矛盾中进一步认识并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全面从严治党”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这个提法表明了对中国系统中最重要之要素——共产党自身素质的最优状态之期望。

“全面从严治党”固然可以包含在“全面深化改革”内，但不等于可以自动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国家发展之间生死攸关的意义，必须单独列出，并视为中国命运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④ 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状况的科学判断，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内含坚持党的领导），也是从同样的判断出发的。

系统观念的重要性在于，事物结构的系统性是层层深入的——一个系统内部的局部事物本身也是一个系统，还需要进行系统认识和处理，“全面从严治党”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严治党之必要并非只是因为存在党员干部个人腐败的严重问题，更需要去追溯问题存在的系统性原因，其逻辑关系是：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党内产生了淡化党的领导的倾向，党的政治建设虚化，意识形态领导权放松，党风、政风松懈，潜规则盛行，不正之风半公开化，由此，私欲严重、意志薄弱者就会堕落为腐败分子，其中的身居高位者会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威望。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实际上进行了系统性的全方位“全面从严治党”，包括重拳反腐、加强政治建设与作风建设、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等。几年下来，党内政治状态得到根本改善，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的信心大大增强。

由于“全面从严治党”这个系统工程的实质性进展，使得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系统工程能够在党坚强而正确的领导下顺利推进，能够应对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确保不发生颠覆性错误；而国内建设的成功又能够确保中国自觉承担和积极履行自己的大国责任，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

① 邹谠：《20 世纪中国政治》，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63 页

②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③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1 月 25 日。

④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9 日。

大贡献,加快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显然,只有把系统观念当作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运用于当下中国与世界关系之研究,才能够真正从哲学原理上深入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于三大规律来自大系统的三层递进关系,因此具有科学指导的意义和价值。

1842年,青年马克思尚未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但他一开始就呼唤哲学对世界的实际意义,他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这样的外部表现在一切时代里曾经是相同的。”^①无疑,出于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命题的强烈诉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马克思上述所言之处为自己定位:在这个剧烈变动的世界,坚守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科学性,为解决问题提供思路,“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本文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2020MZD015);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2020WXB00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天竞 编辑:王鑫)

The Concept of Being Systematic Is the Fundamental Way of Thought and Work in the New Era

HUANG Lizhi

Abstract: Today's world is going through the greatest change which was never seen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ake it as a new historical arena of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guiding and pushing forward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these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in Xi Jinping's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first thing is to put up that the concept of being systematic is the fundamental way of thought and work, which means to emphasize 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 of Marxist ideas and methods. Secondly,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being systematic i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se the laws of development in human society,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and identify the re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in which the big system control the small ones, the small systems give impetus to big ones, and the interrelations of all elements within systems, thus to be “continuously finding and creating” in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these three major laws.

Key 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ew era, Marxist philosophy, concept of being systematic, three major laws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